

選舉干預如何影響外交政策與民主運作？ 以 1946-2000 年美蘇的選舉干預為例*

蔡承翰**

壹、前言

貳、文獻檢閱

參、研究假設與變數資料來源

肆、實證分析

伍、結論

外交援助、經濟制裁、軍事干預、選舉干預是國家常在國際社會使用的外交工具。過去研究指出外交援助對於受贈國的經濟發展有正面與負面的影響。另外，軍事干預、選舉干預、經濟制裁則是會對目標國的民主程度產生損害。

Levin(2021)指出美國對其他國家成功的選舉干預會增加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本文以「美蘇的黨派選舉干預」(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by the Great Powers, PEIG)資料庫來驗證選舉干預與外交政策相似性之間的相關性。因為 PEIG 資料庫是以虛擬變數來處理選舉干預，並無法看出選舉干預的程度(degree)差異，以及影響選舉干預程度的因素。因此，本文

* 作者感謝匿名審查人細心的審查與寶貴的建議。尤其是方法論的建議，讓作者受益良多。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E-mail: chage11302001@gmail.com

投稿日期：2021年8月2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1月13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1/第三十九卷第二期/頁 1-54。

採用貝氏潛在因素模型 (Bayesian latent factor model) 來探討影響選舉干預程度的因素。

根據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結果，1946 年至 2000 年，美國與俄羅斯 (蘇聯) 的軍事實力是兩國選舉干預程度的重要因素。同時本文發現，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確實會增加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但兩國外交政策立場接近的前提是，美國的選舉干預侵害了該國的民主制度，尤其是水平式的民主課責機制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關鍵詞：選舉干預、民主程度、選舉干預程度、貝氏潛在因素模型、水平式的民主課責機制

壹、前言

在國際關係的研究議題裡，國家常以外交政策作為工具來達成政治與經濟的利益，並藉此符合自己的國家利益。例如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為了防止戰後的歐洲國家受到共產主義與蘇聯勢力的入侵，執行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來援助歐洲，協助西歐國家的經濟發展與復甦。此外，除了國家行為者之外，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也會透過一些措施來影響國家的國內政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透過一些財政紓困措施來幫助陷於金融危機的國家，希望可以使被援助國的經濟條件恢復至危機前的水準。而被援助國也必須依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條件，來進行政治制度與經濟結構的調整。1997 年南韓與 2008 年希臘的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就是透過外交援助來改善被援助國原本不健全的政治、經濟、金融體制。

跨國公司也會對政府透過遊說與賄賂的手段，取得公共部門採購合約（public procurement contracts）與簡化海關手續（customs procedures）。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就指出，跨國公司賄賂的金額大約佔總體交易價值的 10.9%（OECD, 2014）。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行為者與非國家行為者會採取相關政策工具來影響目標國家（target country）的國內政治。除了前述所提到的馬歇爾計畫、財政紓困措施、跨國公司的遊說與賄賂等方式，國際關係中還有許多各種形式的外交工具來影響國家內部的政治局勢。例如：經濟制裁（economic sanctions）、維和部隊派遣（peacekeeping operations）、內戰干預（interventions in civil wars）等外交措施皆是以自身的影響

力來對目標國家達到特定政治與經濟目的，並更進一步地來維護捐助國（donor countries）的外交利益。

更有甚者，外國勢力（foreign power）會透過干預目標國家的選舉，藉此改變目標國家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與政體類型（regime type）。或者是透過對目標國家選舉的干涉，資助特定候選人來增加其當選的機率。Levin（2016）指出公開的選舉干預比不公開的選舉干預更有助於特定候選人的當選機率。既然外交工具的干預是為了達到特定政治與經濟目的以及外交利益，那對於干預國而言，想要達到什麼樣的外交利益？更進一步來說，在達到干預國所設定的政治與經濟目的後，對干預國與目標國彼此之間的外交政策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舉例來說，若外國勢力對目標國內部選舉的干預達到目的後，對兩國的外交政策利益是否有影響？一般而言，若目標國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在外國勢力支持下順利贏得選舉後，在外交政策上，會和干預國的外交利益趨近。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於，在選舉干預的條件下，國家之間的外交利益是否會趨於相近？而目標國要犧牲什麼樣的代價？本文以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為例，實證結果發現，不管是公開或秘密的選舉干預，美國的選舉干預會使目標國的外交利益與美國趨於一致，但前提是要犧牲目標國的水平式民主課責監督機制。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一開始為前言，第二部分文獻檢閱。第三部分則是研究假設與變數資料來源。第四部分實證結果分析；最後則是結論。

貳、文獻檢閱

過去有不少研究在探討強權國家如何運用外交政策與工具來影響其他國家內部的政治局勢。而這樣的外交影響力不限於經濟制裁、外交援助、維和部隊、石油禁運等相關方式。過去殖民國家與被殖民國家之間的關係，殖民國家對被殖民國家採取廣納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或榨取式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s*）會決定被殖民國家的經濟發展。

Acemoglu et al. (2001) 的研究指出當居住在被殖民國的歐洲殖民者死亡率較低時，歐洲國家會比較容易對被殖民國家採取廣納型制度。而這樣的制度反而會存留下來，影響日後被殖民國家的經濟發展。例如：澳大利亞過去是英國的殖民地，而居住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也希望在可以有像母國一樣的公民權利與政治制度，諸如免於被任意逮捕的自由、選舉代表等權利與制度。最後，當時的英國政府准許了他們的要求，也對澳大利亞的政治制度做出修正，以符合居住在澳大利亞的英國人所要求之權利。Acemoglu et al. (2001) 認為歐洲殖民國定居者在被殖民國的死亡率，決定了該被殖民國的政治體制是廣納型或榨取式制度，並影響日後的經濟發展。更進一步說，歐洲殖民國定居者在被殖民國的存活率愈高，該國愈不容易採取榨取式政治制度，日後經濟發展也較好。過去也有研究指出歐洲殖民國家對被殖民國家內部政治制度的影響，會對被殖民國家的長期經濟發展產生不同的影響（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9; Cain and Hopkins, 1993）。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國家也會以外交援助作為一種外交工具，來協助受援助國家的經濟發展。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認為外交援助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但發展中國家也必須有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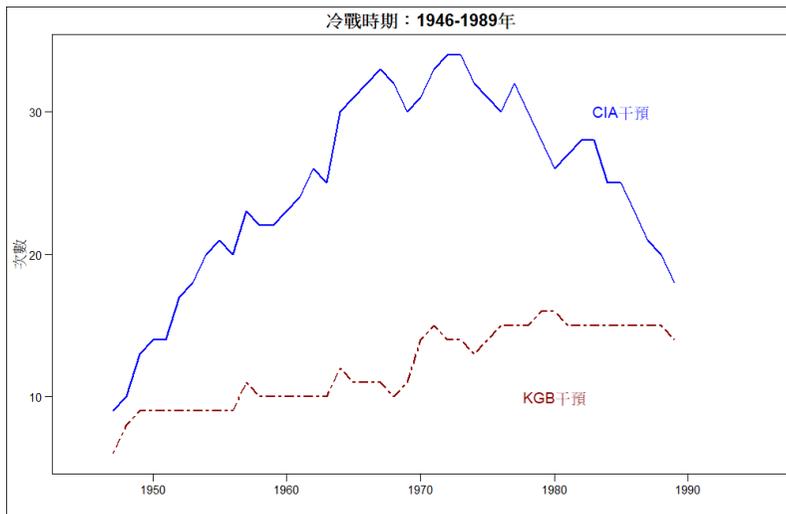
的財政、貨幣、貿易政策，才有辦法讓外交援助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Hansen and Tarp (2000)** 則是指出，外交援助可以增加儲蓄率與投資，最後則是有助於經濟成長。與 **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研究的差異在於，**Hansen and Tarp (2000)** 認為即便在被援助國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並未完善的條件下，外交援助依舊可以達到經濟成長的效果。後續有不少研究以 **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的文章為基礎，也得出外交援助有助於受贈國經濟發展的論點 (**Collier and Dollar, 2002; Dalgaard and Hansen, 2001**)。

相較於外交援助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的論點，**Easterly (2003)** 則是認為外交援助並未如前述研究結果所言，對被援助國的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即便是被援助國的政治制度完善，也無法達到前述文獻所說的正面效果。**Easterly (2003: 35)** 以對非洲地區進行的外國援助為例，他發現大約從 1970 年到 1999 年，外國援助愈多對人均 GDP 的成長並沒有實質貢獻。尤其是從 1983 年開始，外交援助佔 GDP 的比例逐漸地增加，但非洲地區的人均 GDP 卻沒有呈現正向增長。雖然之後人均 GDP 有成長，但增長幅度有限。與前述研究結果相異，**Collier and Hoeffler (2004)** 的研究結論則是認為對於戰後亟欲恢復的國家經濟而言，在控制政府制度的條件下，外國援助剛開始三年對於經濟成長並無效用；而是要等到接下來的第一個十年，外國援助才會有助於經濟成長，成長幅度大約會高於之前正常水準的兩倍。

從國內政治的研究領域來看，外交工具的干預有時是對目標國的國內選舉進行干預。**Aidt et al. (2021)** 就指出冷戰時期，美國與俄羅斯（蘇聯）以選舉干預手段來影響其他國家內部的選舉結果。圖

一是以 Aidt et al. (2021) 所提供的資料所繪製的。¹

圖一可以看出，相較於俄羅斯（蘇聯），美國在冷戰時期對其他國家內部選舉干預的次數相對多。而 Levin (2016) 則是運用「美蘇的黨派選舉干預」（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by the Great Powers, PEIG）資料庫來分析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國內選舉干預的影響程度。²他發現從 1946 年至 2000 年，美國與蘇聯（俄羅斯）在這期間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尤其是對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的支持，確實會增加其勝選的機率。另外，他也發現公開的選舉干預（overt）比秘密的選舉干預（covert）更有效。



圖一 冷戰時期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的選舉干預次數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Aidt et al. (2021) 的資料自行繪製。

1. Aidt et al. (2021) 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文件所揭露的訊息，建立起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在冷戰時期對其他國家內部選舉的干預。
2. Levin (2019b) 指出，根據 PEIG 的資料庫，從 1946 年 1 月 1 日到 2000 年 12 月 31 日，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總共對其他國家進行 117 次的選舉干預。

Levin (2019a) 更進一步地指出，美國或俄羅斯（蘇聯）的公開選舉干預會對目標國的民主程度造成影響。Berger et al. (2013) 的研究也指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國內政治的干預，也會損害該國的民主。他們指出美國的外交干預，對目標國的民主有短期與中期的損害。另一方面，相較於美國外交干預的影響程度，俄羅斯（蘇聯）對他國國內政治的干預，對目標國民主程度的損害則較為小。

Peksen and Drury (2010) 則是研究經濟制裁對被制裁國家民主發展的影響程度，他們指出，經濟制裁反而會使被制裁國家的政治自由受到限制，同時讓國家朝向威權體制，不利於民主發展。Ping et al. (2022) 研究指出，中國對於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進行外交援助，換取受贈國的自然資源。而在這樣的援助機制下，中國式的外交援助也侵蝕了當地國的水平式的民主課責機制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過去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干預國採取不同類型的外交工具對目標國進行干涉時，對目標國的民主發展皆有不利的影响 (Bueno de Mesquita and Downs, 2006; Peceny, 1999; Pickering and Peceny, 2006; Walker and Pearson, 2007)。

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可以使用外交工具企圖影響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發展。而這個外交工具可以是經濟制裁、外交援助、軍事干預、選舉干涉等執行方式。執行外交工具的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有時是為了協助受援國家的經濟發展、衝突解決、戰後重建等相關議題。例如，美國想要藉由軍事干預或經濟制裁來對目標國進行政治體制的改變 (regime change)。國際貨幣組織藉由有條件式的經濟援助來協助受援國家的經濟與金融危機。此外，也有非國家行為者為了利益極大化而對目標國的政府作出違法貪污的行為，例如：跨國公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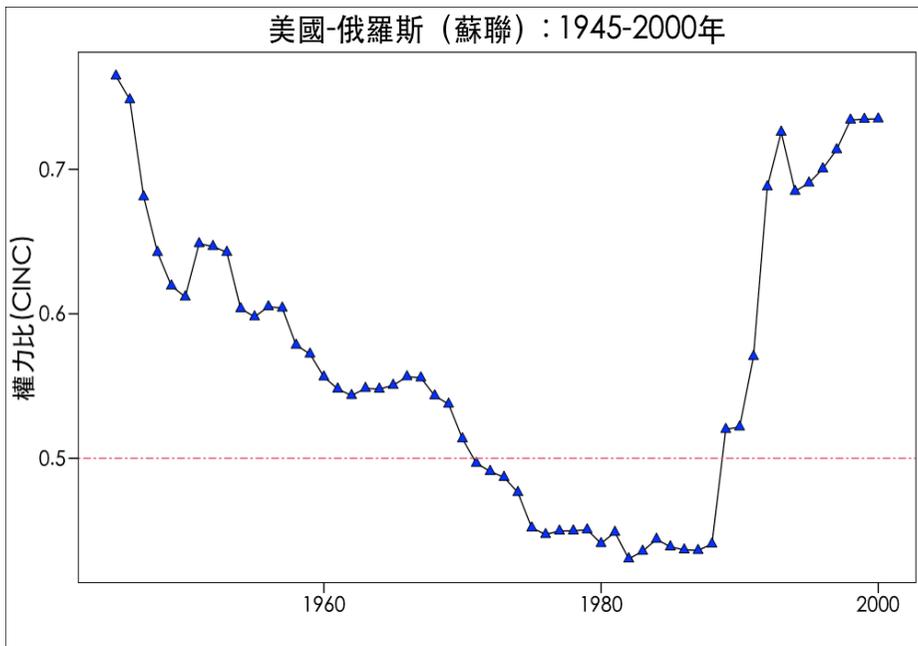
遊說與賄賂行為。總體來說，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對某些國家採取外交工具的施行，皆是希望可以達到特定的政治與經濟目的。

Levin (2016) 的研究指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所進行的選舉干預有利於他們在國內選舉中獲勝。本文認為，強權國家對特定國家的政黨或候選人給予選舉支持，不只是與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意識形態相近，更重要的是要在日後的外交議題上，可以有相同外交政策利益的夥伴，藉此增加日後的外交合作。例如：冷戰時期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以及由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為基礎的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在前述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為什麼國家之間外交政策利益的相似性值得更進一步的探討？從 Waltz (1979) 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來看，國家利益受到無政府狀態的制約，因此國家會追求利益極大化。對小國而言，小國會自動地結盟（alliance）來制衡（check）大國的威脅。根據 Waltz 的論點，當國家意識到有一個大國，或者是說該國的國家實力正處於爬升階段，且在未來會成為國際體系的強權國家時，其他國家為了國家利益極大化，就會在外交上自動地結盟來制衡這個潛在強權國家所帶來的威脅。二戰結束後，當時的德國（西德）與法國意識到俄羅斯（蘇聯）在未來還是會有機會在歐洲大陸對他們造成國家安全的威脅，所以先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展開外交合作，在外交政策上逐步地達成共識，並深化彼此之間的外交合作關係，並增進彼此之間的國家利益。而這樣的合作關係，逐步地將原本德法的外交合作關係擴展至其他歐洲國家，形成現在的歐洲聯盟。

若依照 Waltz 的論點，對於俄羅斯（蘇聯）在歐洲大陸的威脅，

德國（西德）與法國的外交合作，可以視為是小國之間彼此結盟來制衡強權國家的威脅。但問題在於，為什麼當時德國（西德）與法國是對抗俄羅斯（蘇聯），而不是在二戰期間為同盟國提供戰爭物資，號稱民主兵工廠的美國？因為根據現實主義的論點，該理論主張國家實力相對於強權國家較弱的國家，必須自動地結盟來對抗強權國家所帶來的威脅。冷戰時期下的國際體系，強權國家對其他國家所帶來的國家利益威脅不只有當時的蘇聯而已，應該還有美國才對。又或者更進一步地說，按照現實主義的論點，冷戰時期的相較於當時的蘇聯，美國更應該被視為是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威脅才對。



圖二 美國與俄羅斯（蘇聯）之間的權力比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的資料自行繪製。

為何冷戰時期的美國更應該被視為是國際體系內其他國家的國家安全威脅？圖二以 Singer et al. (1972) 所建立的國家能力綜合指標 (Composite of Index of National Capacity, CINC) 繪製出美國與俄羅斯 (蘇聯) 之間的國家實力權力比。權力比 0.5 代表兩國國家實力接近。權力比愈大，代表美國國家實力高於俄羅斯 (蘇聯)，反之亦然。圖二可以明顯看出，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國家實力是高於俄羅斯 (蘇聯)。尤其是自 1989 年後，俄羅斯 (蘇聯) 的國家實力更是遠遠落後於美國。因此按照現實主義的論點，當時德國 (西德) 與法國要制衡的對象應該是美國才對，而不是俄羅斯 (蘇聯)。

權力轉移理論學者認為，當時國際體系內的某些國家並未將美國視為安全威脅，是因為當時部分國家滿意並加入當時美國所建立的國際建制，所以並未制衡美國。例如，英國的國家實力被美國趕上，兩國並未發生戰爭，英國也支持美國所建立的相關國際建制 (Tammen et al., 2000)。也就是說，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國家利益並非如現實主義所主張的，是外生給定的 (exogeneity)，是存在內生性 (endogeneity) 的可能性。

國家利益並非如現實主義所主張，國家實力相對小的國家會將大國視為國家利益的威脅，並自動地在外交上彼此結盟來對抗大國。權力轉移理論則認為大國對小國而言不必然是威脅，如果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外交政策立場相近時，大國與小國之間的外交合作反而會更加緊密。正如本文之前提到的，二戰結束後，美國所建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不只與奉行市場經濟國家的外交政策立場相近，也符合其國家利益。同樣的，當時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也是認為在外交政策與國家利益上與當時的蘇聯相近，才會選擇加入該組織。這也是 Keohane (1984, 51:55) 所提到的，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可以分成和諧 (harmony)、合作 (cooperation)、不一致 (discord)。以合作為例，國家之間要外交上先透過協商來調和對特定外交議題立場的

差異，在不危害個別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達成外交合作。Keohane 也指出，和諧與合作相異的地方在於，國家個別行為的後果會自動地達成自身所欲之目的，並與他國的利益一致。Keohane 以自由市場競爭為例，市場中看不見的手驅使每個人在市場上利益極大化，而每個人的競爭行為也對他人的利益有所貢獻。也就是說，外生給定的假設，無法解釋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為何會選擇合作、制衡、扈從等不同策略。我們必須考量內生性因素對國家外交政策選擇的影響。

國家領導者因為外部勢力的選舉干預而贏得勝選確實會在外交政策立場上與干預國的外交立場較為一致。Levin (2021) 的研究指出相較於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美國的選舉干預比俄羅斯(蘇聯)更能夠使目標國的外交政策立場與其相近。既然 Levin 已經確認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會增加目標國與其外交政策立場之間的相似性。那本文為何還要研究此問題？其中一個原因在於 Levin (2019b)使用的 PEIG 資料庫是採用虛擬變數來看美國或俄羅斯(蘇聯)是否有對其他國家選舉進行干預。但冷戰時期美蘇兩大強權對峙的兩極體系，採用選舉干預的外交工具不只有國際體系因素，也有國內因素的考量。例如：當時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軍事實力與經濟發展等因素，不只會影響兩國是否願意採取選舉干預與否，也會導致選舉干預程度的變化，進而影響選舉干預的效用。而虛擬變數是無法直接比較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受到國內因素影響的條件下，他們的選舉干預程度是否有所差異。因此，本文援引 Benson and Clinton (2016)對於聯盟的處理方式，來對 PEIG 資料庫中有關選舉干預變數進行貝氏估計，嘗試讓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的選舉干預程度有其可比性。³ 另外一個原因可以從內生性因素的角度來看，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對接受此援助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而

3. 本文會在後續文章提及應用何種貝氏估計。

言，其實是違反民主制度中公平選舉的原則。既然選舉干預破壞了民主制度的內涵，那目標國是不是因此才會在外交立場上選擇與干預國相近？

綜上所述，在符合增加國家利益的前提下，美國與俄羅斯（蘇聯）才會對特定的政黨或候選人進行選舉干預，使他們在選舉中贏得勝選。而這樣的選舉干預，是有機會促進彼此之間外交行為的一致性。因此，本文在過去的研究論點上，在更進一步地探討，在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競爭下，美國選舉干預的程度，是如何增加目標國家與其外交政策利益的相似性。

參、研究假設與變數資料來源

一、研究假設

綜整前述文獻，強權國家對其他國家內部選舉的干預，對該國的執政黨或挑戰者而言，相較於接受援助的一方，對未接受的一方而言代表著是不公平的國內選舉。同時這也違反了民主制度下公平且公正的選舉原則。然而強權國家對他國的選舉干預卻會因此增加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

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有兩個：

假設一：在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外交競爭下，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其他國家內部選舉干預的程度，意指對特定候選人或政黨的支持，從內生性的角度來看，會侵害目標國的民主制度。

假設二：美國對其他國家內部選舉干預的程度，是先侵害了目標國的民主制度然，再增加目標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立場上的相似性。

二、變數資料來源

(一) 被解釋變數

本文的被解釋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是以各國的外交政策立場分別與美國和俄羅斯 (蘇聯) 之間的距離。聯合國大會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中對各項外交議題的投票行為是最常用來測量國家之間外交政策立場是否相近的資料。Bailey et al. (2017)、Bennett and Rupert (2003)、Gartzke (1998; 2000)、Kim and Russett (1996)、Signorino and Ritter (1999)、Sweeney and Keshk (2005) 等學者也採用聯合國會員在聯合國大會中對各項外交議題的投票結果來測量國家之間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程度。

正如薛健吾 (2020: 74) 所指出, 聯合國會員國針對某項特定外交議題的一次性投票, 如果剛好投票偏好相同, 那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可能是巧合。但是當投票次數變多時, 各國之間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就會開始顯示出來。因此本文延續過去研究的做法, 選擇採用 Bailey et al. (2017) 的資料作為測量國家之間彼此之間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在被解釋變數的數值處理上, 以其他國家與美國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為例, 是以該國在資料庫中的數值減去美國的數值後取絕對值, 絕對值愈大, 代表該國與美國在外交政策立場上的距離較大。同樣在計算其他國家與俄羅斯 (蘇聯) 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 也是採用前述作法。在本文的實際操作中, 則是以虛擬變數來定義樣本國家是否以美國外交立場為定錨點, 進行實證估計。

(二) 解釋變數

延續 Levin (2021) 的研究, 本文主要的解釋變數 (explanatory variable) 為**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程度**是否會使目標國的外交政策立場與其相近。

Levin (2021) 的研究，是採用「美蘇的黨派選舉干預」(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by the Great Powers, PEIG) 資料庫。該資料庫將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其他國家選舉的干預形式分成秘密、公開、是否提供競選資金給特定政黨與候選人、是否提供其他不同於競選資金的幫助給特定政黨與候選人、是否採用軍事手段對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提供協助等其他方式。PEIG 資料以虛擬變數來處理選舉干預變數，若美國或俄羅斯(蘇聯)有對該國採取秘密或公開的選舉干預，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

正如本文之前所提到的，虛擬變數無法看出選舉干預的程度 (degree) 並進行比較。以國家之間的聯盟 (alliance) 為例，Benson and Clinton (2016) 就指出不管是攻擊性聯盟或防禦性聯盟，聯盟成員的軍事實力、條約內容、成員所該付出的行動成本、在不同戰爭發生條件、成員該採取何種軍事行動、外交政策立場相似性程度等因素 (factors) 皆會影響聯盟的深度 (depth) 與廣度 (scope)。過去採用虛擬變數來處理聯盟的作法，並無法測量出前述的概念。因此，Benson and Clinton (2016: 869-873) 以「貝氏潛在因素模型」(Bayesian latent factor model)，並考量聯盟成員國的軍事實力、外交政策立場相似性程度、不同戰爭類型，成員國該採取何種行動等諸多因素，來測量出聯盟的深度 (depth) 與廣度 (scope)。

Benson and Clinton (2016) 的研究方法正好可以應於本文主要解釋變數的概念，哪些國內因素會影響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其他國家選舉干預的程度。以 PEIG 資料庫橫跨的年度來看，剛好是國際局勢處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美蘇兩大強權國家對峙下的局勢。美國與俄羅斯(蘇聯)憑藉著自身的軍事與經濟實力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干預、經濟援助等外交競爭，希望藉相關外交工具來增加自己的國家利益。因此，本文認為在 1946 年至 2000 年之間，美國與俄羅斯(蘇

聯)採取選舉干預作為對他國的外交工具時,其選舉干預之程度是會受到各自軍事實力、經濟發展、選舉干預形式、勝選聯盟與遴選聯盟比值等因素的影響。

因為冷戰時期,美國與俄羅斯(蘇聯)不僅在軍事實力上較勁,同時也將國家實力延伸至其他國家而有所謂的代理人戰爭(proxy war),例如:韓戰。同時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在全球層次的競爭,也必須要有經濟實力才有辦法支持他們外交工具的執行。正如 Kugler and Tammen (2012)所指出的,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好壞,代表該國有多少資源可以運用並達成所欲之政策目標。雖然他們指的是國家內部政策面向,但本文認為外交政策也一樣,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外交工具也必須要有國內資源的分配與應用,才有辦法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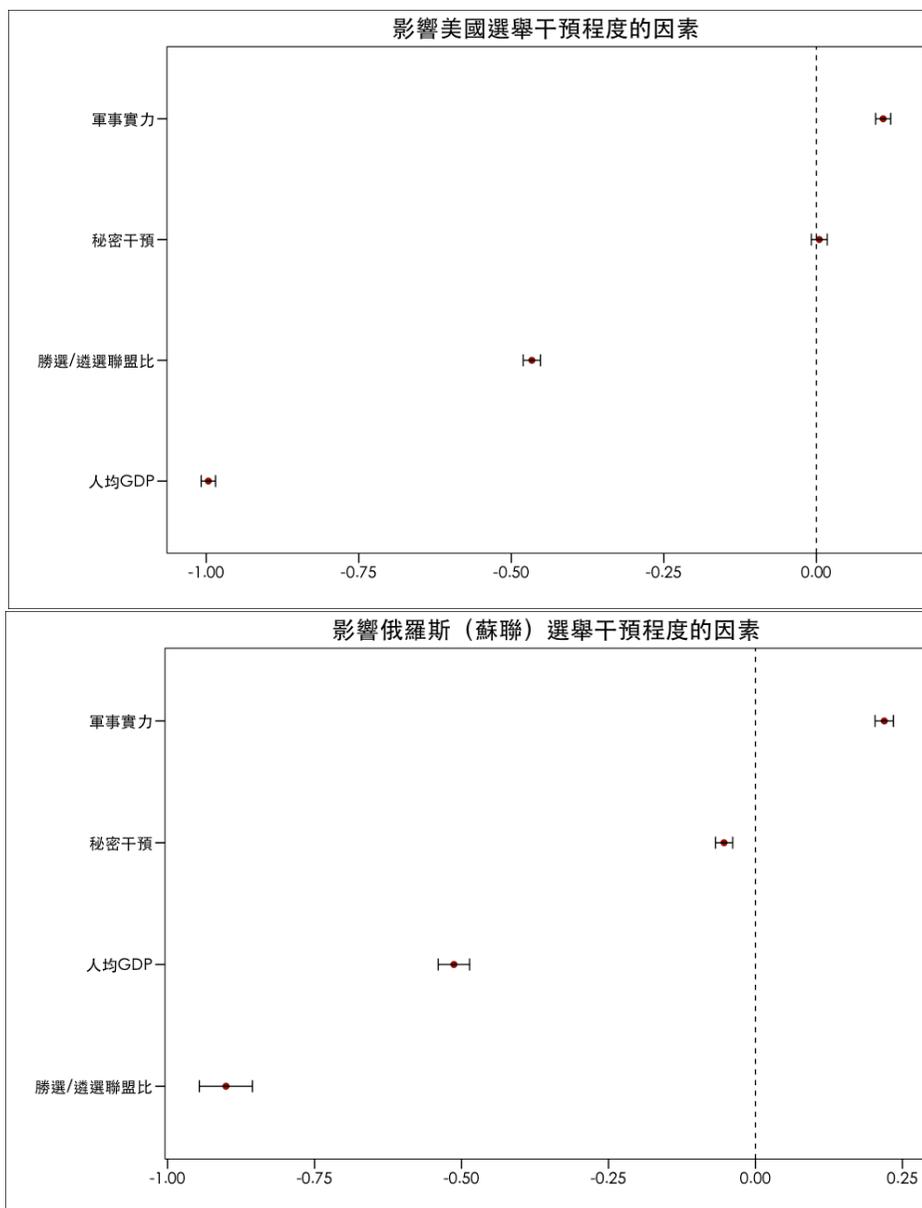
另外,根據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的遴選集團理論(selectorate theory),相較於威權國家的勝選聯盟(winning coalition),民主國家的勝選聯盟比較大,也就是說在選舉的時候,需要得到的支持較多,因此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戰爭。據此,本文認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也會因為各自國內勝選聯盟的大小,影響著他們以選舉干預作為外交工具的效用。最後,正如 PEIG 資料庫所顯示的,選舉干預的種類相當多,不同類型工具的影響程度也不盡相同,虛擬變數並無法探究在前述的國內因素下,選舉干預類型對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程度。因此本文應用 Benson and Clinton (2016)文中的貝氏潛在因素模型(Bayesian latent factor model),以軍事實力、經濟發展、選舉干預形式、勝選聯盟與遴選聯盟比值來看哪一個因素對選舉

干預程度的影響程度較大。⁴

對於影響選舉干預程度的測量，主要是以R語言中的MCMCpack套件來進行貝氏估計。圖三為應用貝氏潛在因素模型後，來看軍事實力、經濟發展、選舉干預形式、勝選聯盟與遴選聯盟比值對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⁵

圖三可以明顯看出，相較於其他因素，軍事實力是影響美國與俄羅斯（蘇聯）選舉干預程度最重要的因素。⁶ 也正如本文之前所說，兩大強權在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的國際局勢下，強大的軍事實力促使他們各自對他國採取選舉干預作為外交工具，且增加選舉干預的程度。另外，圖三也可以看出，相較俄羅斯（蘇聯）的秘密選舉干預形式，美國的秘密干預形式影響其選舉干預的程度較大。而經濟發展並未如本文之前所提的，可以增加選舉干預的程度。相較於軍事實力，勝選聯盟與遴選集團聯盟比值對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較低。但從勝選聯盟與遴選集團聯盟比值各自對美國與俄羅斯（蘇聯）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來看，勝選聯盟較大的美國，對其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較大。而這也與 Bueno de Mesquita et al.（2003）的論點一致，民主國家的執政者為了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發動戰爭的成本較威權國家高。應用在本文的例子即是說明，威權體制國家的俄羅斯（蘇聯）勝選聯盟較小，不易受到國內勢力牽制，反較容易採取選舉干預做為外交工具並增加其程度。

-
4. 本文將勝選聯盟與遴選集團之間比值的估計方式放於附錄一。軍事實力以 CINC 作為測量指標；經濟發展以人均 GDP 來測量。前述變數皆是本文所使用的解釋變數。
 5. 本文在附錄二解釋如何透過貝氏潛在因素模型將觀察到的資料與未觀察到的因素結合起來並進行貝氏估計。
 6. 詳細的貝氏潛在因素估計結果可以參考附表二之一。



圖三 貝氏潛在因素模型估計後的美國與俄羅斯（蘇聯）選舉干預程度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PEIG 資料庫（Levin, 2019b）並自行繪製。

根據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實證結果，根據不同年份，會給予美國與俄羅斯（蘇聯）選舉干預程度的數值（ ϕ ），而這個選舉干預程度的數值即是所欲測量的潛在因素，並受到圖三所列因素的影響。最後，因為本文是要觀察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程度是否會使目標國的外交政策立場與其相似性。本文主要解釋變數為**其他國家外交政策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與美國對他國選舉干預的程度**。前者為虛擬變數，若該國外交政策是以美國為定錨點，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最後，則是將此虛擬變數與選舉干預程度的數值相乘形成一個交互變項（interaction term）。

（三）其他控制變數

除了前述解釋變數外，本文也控制其他幾個可能會影響外交政策立場變化的變數。首先是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此資料是取自於 Cheibub et al. (2010) 所建立的國家政體資料庫，此變數為虛擬變數。若該國為民主國家則編碼為 1；反之則為 0。本文同時也控制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是以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 所提供的人均 GDP 為測量變數（Bolt et al., 2018）。本文也建立民主程度與人均 GDP 的交乘變項，控制各國民主程度與經濟發展變化對與美國或俄羅斯（蘇聯）外交政策相似性的影響。另外，本文也控制國家之間的權力比（power ratio），資料是取自戰爭關聯計畫（the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COW）中的國家能力綜合指標（Composite Index of National Capacity, CINC）。同時本文也控制經濟制裁與軍事干預等變數，分別取自 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TIES 4.0) 與 Internatio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等資料庫（Kisangani and Pickering, 2008; Morgan et al., 2014; Pearson and Baumann, 1993）。此兩個變數皆為虛擬變數，只要在該年度美國或俄羅斯（蘇聯）對目

標國採取任何形式的經濟制裁或軍事干預，即編碼為 1。最後則是控制各國的人口規模以及各國與美國或俄羅斯（蘇聯）是否相鄰（contiguity），人口規模資料取自於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8（Bolt et al., 2018），並轉換成自然對數（natural logarithm）。

本文的估計式如下：

$$\begin{aligned} & \text{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立場相似性}_{i,t} \\ & = \varphi \text{美國對他國選舉干預的程度}_{i,t} \\ & + \gamma \text{選舉干預的程度}_{i,t} \\ & + \beta \text{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_{i,t} \\ & + \omega \text{控制變數}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本文因為受限於 PEIG 資料庫的限制，因此實證估計時間軸是從 1946 年橫跨至 2000 年，總共 55 年。相關變數的描述性統計置於附錄三。

上述估計式的主要解釋變數為美國對他國選舉干預的程度，並檢驗 Levin（2021）的實證結果。但正如本文接下來在實證分析部分所詳述的內容，上述實證估計式的結果並未與 Levin 的實證結果一致。因此本文更進一步地驗證是不是美國的選舉干預先侵害目標國的民主機制，然後該國才會與美國的外交立場相近。也就是本小節開頭所要驗證的主要研究假設。

因為 Cheibub et al.（2010）對於民主制度的測量是採用虛擬變數來看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該測量方式無法看出民主制度的發展程度與內涵。為驗證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是否會損害目標國的民主制度及其運作方式，本文採用不同的方式。本文認為民主制度的運作應該包含水平課責機制（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與垂直課責（vertical accountability）機制。因此本文以多元民主研究中心中的水平課責指標（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dex）與垂直課責指標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index) 作為測量民主制度的指標，來做更進一步的檢驗 (Coppedge et al., 2020; Pemstein et al., 2020)。

民主制度下的水平課責機制是指政府機關之間的相互制衡，避免特定行政機關權力獨大且違法濫權；垂直課責機制則是由民間或人民對政府機關或政治人物的監督，在民主社會中通常是透過公平定期的選舉來對政府或政治人物進行垂直課責。也就是說若國內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接受國外的選舉援助或干預，是否會對民主的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制度造成侵害。

肆、實證分析

在實證估計方面，表一先採用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來對本文的研究假設進行估計。在採用最小平方法進行實證估計時，本文也包含個別國家及年份等變數來加以控制。沒有控制個別國家與年份的最小平方法估計式，是將每個年份下的每個國家的變異性視為有齊一性特質 (homoscedasticity)，也就是說將每個國家的特徵視為同質性；同時也將個別國家在特定年份發生的事件對其影響的程度皆視為一致。

舉例來說，某些歐洲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相較於其他歐洲國家就是與美國立場較為相近，例如：英國，此可能是源自於同樣是英語系國家，又或者是領導者個人因素所導致的外交偏好。另一方面，特定年份下的某個國家，可能會因為特定國內或國外的事件發生，影響了該國對其他國家的觀感，而導致彼此之間外交政策立場上出現分歧。例如：中國對特定西方國家採取戰狼外交，其他國家並未因此在外交政策上與中國保持距離。每個國家的國情皆有所不同，而特定年份發

生的事件會對不同國家產生不同影響。因此要保持每個國家的相異性，在實證估計上就是讓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截距項（intercepts）。Marvell and Moddy (1996) 認為透過控制國家與年份的方式，就可以解決上述將每個國家的變異性視為同性質的問題。

接下來本文更進一步採用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來驗證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設是否可以得到進一步的驗證。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結果已經類似差異中的差異（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方法，其實證效果也比最小平方法更為嚴謹。本文未採用 Levin (2016) 配對方法（matching methods）的原因如下。從識別策略（identification strategy）來看，配對方法可以消除隨時間變化且未觀察到的變數（time-varying unobserved variable）對估計的影響；固定效果模型則是消除隨時間未變化且無法觀察到變數（time-constant unobserved variable）的影響，但隨時間變化且未觀察到變數的影響依舊存在。

雖然隨時間變化未觀察到的變數依舊存在，如前所述，有些未觀察到的因素會在某個年度發生改變，甚至持續一段時間並產生影響。固定效果模型則是保留這些未觀察到且隨時間變化因素對估計的影響。從計量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在 XY 平面上，隨時間未變化且未觀察到的變數在 X 軸上可視為一條垂直線，而隨時間變化且未觀察到變數卻可以在 X 軸上有時間序列的動態變化。同時 Green et al. (2001) 也指出，考量個別國家與不同年度的影響，可以控制它們並納入其影響在估計中。根據上述考量，本文因此選擇固定效果模型作為推論工具。⁷

首先，本文先驗證 Levin (2021) 的研究論點，同時應用貝式潛

7. 作者感謝審查人在方法論上提點關於配對方法估計中有關識別策略的議題。也讓作者更進一步思考並補充採用固定效果模型的理由。

在因素模型估計後的選舉干預程度指標來驗證美國對他國的選舉干預是否會增加目標國與美國之間外交立場的相似性。表一中的 OLS (1) 與 FE (2) 則是分別列出最小平方法與固定效果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出表一中的兩個模型的實證估計結果幾乎完全相同。但是主要解釋變數，**美國對他國選舉干預的程度**，與 Levin (2021) 的研究結果並不相符。也就是說，本文表一的研究結果顯示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並不會使兩國的外交政策的相似性增加。

若再仔細看表一的估計結果，本文發現在保持選舉干預程度不變的條件下，若該國為民主國家，且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以美國為定錨點的話，兩國之間的外交政策立場一致性會減少。如果該國是民主國家且經濟發展並未衰退，且外交政策立場是以美國為定錨點的話，則該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相似性會增加。前述研究結果其實類似薛健吾 (2020) 的研究發現。薛健吾 (2020) 以中東歐 16 個國家為例，中東歐國家如果在民主程度衰退與經濟發展不佳的條件下，他們的外交政策相似性則會與俄羅斯 (蘇聯) 相近。本文表一的實證估計結果，若將該國外交政策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的虛擬變數改成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俄羅斯 (蘇聯) 為定錨點，實證結果顯示若該國是民主國家，且經濟有所增長，那其外交政策立場則會遠離俄羅斯 (蘇聯)。

另一方面，本文表一的估計結果顯示，美國對民主國家的選舉干預，加上目標國外交政策立場是以美國為定錨點的條件下，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並不會增加。事實上，這樣的實證結果必須再更進一步地驗證。正如文獻檢閱所指出的，美國與俄羅斯 (蘇聯) 對他國選舉的干預會侵蝕目標國的民主 (Berger et al., 2013; Levin, 2019a)。而本文表一的實證結果與薛健吾 (2020) 的研究也指出當國家的民主與經濟發展衰退時，該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立場不相似性會增加。

表一 美國的選舉干預對外交政策影響的實證結果

	OLS (1)	FE (2)
自變數		
美國對他國選舉干預的程度	0.080*** (0.023)	0.080*** (0.023)
控制變數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857*** (0.027)	0.857*** (0.027)
選舉干預的程度	0.055** (0.021)	0.055* (0.021)
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0.331*** (0.046)	0.331*** (0.046)
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4.584*** (0.290)	4.584*** (0.290)
人均 GDP	-0.044 (0.046)	-0.044 (0.046)
人均 GDP×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669*** (0.032)	-0.669*** (0.032)
權力比	-0.061*** (0.006)	-0.061*** (0.006)
經濟制裁	0.649*** (0.051)	0.649*** (0.051)
軍事干預	-0.493*** (0.092)	-0.493 (0.092)
是否相鄰	-1.350*** (0.064)	-1.350*** (0.064)
人口總數	0.000*** (0.000)	0.000*** (0.000)
R-squared	0.260	0.235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0,857	10,857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因此從文獻檢閱與過去的研究來看，本文認為選舉干預確實會侵害目標國的民主發展，而該國的民主程度與經濟發展同時增長的情況下，確實會增加該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那有沒有可能正如本文的研究假設所指出的，選舉干預是否會增加外交政策立場相似性的研究問題，在實證估計上必須先驗證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是否會傷害目標國的民主。然後再探討該國在民主程度受到選舉干預侵害的條件下，其外交政策立場是否會與美國相近？

表二 選舉干預對民主運作影響的第一階段實證結果

	OLS (3) 秘密干預	OLS (4) 公開干預
依變數：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選舉干預的程度	-0.010* (0.004)	-0.010* (0.004)
R-squared	0.710	0.710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1,053	11,053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依變數為 Cheibub et al. (2010) 的二元變數。

在此要說明的是，表二中所謂的秘密干預與公開干預是指在選舉干預程度中的貝氏潛在因素模型估計中分別包含秘密干預與公開干預的方式。之後的圖表若再出現也代表同樣的意義。

本文在表二控制國家與年份的因素後，並以 OLS 估計選舉干預

的程度與民主國家之間的相關性。附錄二的貝氏估計結果顯示包含公開與秘密選舉干預方式對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並未有太大差異。因此表二才会有此一致性結果。從表二可以看出，選舉干預確實會對目標國的民主造成傷害。接下來則是根據表二估計的結果計算出預測值，並將此預測值放入本文前述的實證估計式再進行一次迴歸分析。

表三中的 FE (5) 與 FE (6) 的估計結果非常相似。自變數**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預測值) ×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在 $p < 0.001$ 達至統計顯著水準。也是說美國對他國採取選舉干預的外交工具時，確實會對該國的民主造成傷害，並進而使兩國外交政策的相似性增加。同時表三中的控制變數，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與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預測值) 分別在 $p < 0.001$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本文認為以干預他國選舉的外交手段，確實會侵害目標國的民主。這個論點符合過去研究結論。而在外交政策立場上要與干預國採取一致立場的前提為目標國的民主受到侵害時，才會讓目標國的執政者與干預國在外交政策上有一致立場。畢竟外國勢力介入的選舉，已非民主制度下所秉持的公平選舉原則。而在此條件下勝選的特定政黨與候選人也會在民主原則被破壞的條件下，在外交政策上與干預國採取一致立場。更進一步來說，選舉干預增進干預國與目標國外交政策相似性的一個中介因素即是目標國的民主受到損害，才會讓以選舉干預為主的外交工具得以發揮其功效。

表三 選舉干預對民主運作外交政策影響的第二階段實證結果

	FE (5) 秘密干預	FE (6) 公開干預
自變數		
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預測值）×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2.219*** (0.363)	2.218*** (0.363)
控制變數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1.009*** (0.029)	1.009*** (0.029)
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預測值）	- 10.964*** (1.804)	- 11.063*** (1.811)
人均 GDP	-0.079 [†] (0.046)	-0.079 [†] (0.046)
人均 GDP×該國是否為民主國家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455*** (0.038)	-0.455*** (0.038)
權力比	-0.071*** (0.006)	-0.071*** (0.006)
經濟制裁	0.712*** (0.051)	0.712*** (0.051)
軍事干預	-0.502*** (0.091)	-0.502*** (0.091)
是否相鄰	-1.337*** (0.064)	-1.337*** (0.064)
人口總數	0.000*** (0.000)	0.000*** (0.000)
R-squared	0.243	0.243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0,857	10,857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p<0.1, *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前所提及，虛擬變數無法看出民主制度的發展程度及其內涵。因此本文在此更進一步檢視外國的選舉干預如何影響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機制，並進一步影響外交政策。迴歸分析依舊控制國家與年份因素，並採用 OLS 來估計選舉干預是否會對民主國家的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制度產生損害。⁸ 附錄四顯示，選舉干預會傷害目標國的水平課責機制，對垂直課責機制則是沒有影響。接下來按照表三的實證估計做法，來觀察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制度受到選舉干預的影響後，如何影響目標國與美國之間的外交立場相似性。實證結果則是在表四與表五顯示。

表四 選舉干預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第二階段實證結果（水平課責）

水平課責（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FE (7) 秘密干預	FE (8) 公開干預
自變數		
該國水平課責程度（預測值）×該國外交政策 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2.192*** (0.169)	2.192*** (0.169)
控制變數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431*** (0.024)	0.431*** (0.024)
該國水平課責程度(預測值)	-3.767*** (0.663)	-3.791*** (0.664)
人均 GDP	-0.139** (0.046)	-0.139** (0.046)
人均 GDP×該國水平課責程度（預測值）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325*** (0.018)	-0.325*** (0.018)
權力比	-0.061*** (0.006)	-0.061*** (0.006)

8. 本文將此估計結果至於附錄四。

經濟制裁	0.593*** (0.051)	0.593*** (0.051)
軍事干預	-0.520*** (0.092)	-0.520*** (0.092)
是否相鄰	-1.420*** (0.064)	-1.420*** (0.064)
人口總數	0.000*** (0.000)	0.000*** (0.000)
R-squared	0.220	0.220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0,857	10,857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表四的實證結果顯示，**該國水平課責程度（預測值）×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此主要解釋變數在 $p < 0.001$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該解釋變數增加一單位，會增加與美國外交政策不相似性 2.192 個單位。而附表四之一的結果可以看出不管是包含秘密或公開的選舉干預形式，皆會對該國的水平課責機制造成侵害。也就是說，在美國對目標國採取選舉干預且該國水平監督制度受到侵害的前提下，目標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的相似性會靠近 0.059 個單位。⁹ 更進一步來說，在有選舉干預的前提下，接受選舉外援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侵害了該國水平課責監督機制後，才會增加與美國外交政策的相似性。並非如 Levin（2021）的論點所指出，美國對他國的選舉干預後就會直接促使目標國在外交政策態度上採取一致的立場。

9. 我們可以將這個過程視為選舉干預減少水平課責機制 0.027 個單位，然後對目標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立場的相似性會靠近 $0.027 \times 2.192 = 0.059$ 個單位。

表五 選舉干預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第二階段實證結果 (垂直課責)

垂直課責 (vertical accountability)	FE (9) 秘密干預	FE (10) 公開干預
自變數		
該國垂直課責程度 (預測值) ×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1.503*** (0.195)	1.503*** (0.195)
控制變數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542*** (0.023)	0.542*** (0.023)
該國垂直課責程度(預測值)	-17.415*** (2.559)	-17.703*** (2.589)
人均 GDP	-0.134** (0.046)	-0.134** (0.046)
人均 GDP × 該國垂直課責程度 (預測值) × 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	-0.269*** (0.021)	-0.269*** (0.021)
權力比	-0.066*** (0.006)	-0.066*** (0.006)
經濟制裁	0.662*** (0.051)	0.661*** (0.051)
軍事干預	-0.483*** (0.092)	-0.483*** (0.092)
是否相鄰	-1.381*** (0.064)	-1.381*** (0.064)
人口總數	0.000*** (0.000)	0.000*** (0.000)
R-squared	0.221	0.221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0,857	10,857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雖然表五中該國垂直課責程度（預測值）×該國外交政策立場是否以美國為定錨點在 $p < 0.001$ 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正如本文附表四之二的實證結果顯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並未對目標國的垂直課責機制造成侵害，因此雖然表五的解釋變數達到統計顯著水準，但本文認為選舉干預對目標國的水平課責監督機制影響較大，且在侵害目標國的民主制度後，目標國與美國的外交政策相似性才會增加。

另外，表四與表五的研究也發現，在控制經濟制裁、軍事干預、人口規模、經濟發展、與美國或俄羅斯（蘇聯）是否相鄰等變數後，本文發現，國家實力比美國或俄羅斯（蘇聯）小的國家，在外交政策立場上，反而會靠近美國或俄羅斯（蘇聯）。同樣地，若國家在地緣上與美國或俄羅斯（蘇聯）相鄰，也會增加該國外交政策立場與美國或俄羅斯（蘇聯）的相似性。這樣的實證結果也呼應了本文之前所提到的，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態度並非如現實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將大國視為潛在威脅並會自動地制衡大國的威脅。也就是說，小國對大國的外交政策並非是外生給定的，只會採取制衡的策略。而是要考量內生性因素，例如前述的地緣相鄰性。

以本文的選舉干預作為內生性變數來看的話，也呼應了外交政策上的合作並非只有國際體系因素而已。例如：1957 年日本社會黨（Japanese Socialist Party）是反對美日同盟，同時希望日本可以維持中立，並廢除 1951 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因此 1958 年，在冷戰的時空背景與前述的日本國內社會氛圍下，美國艾森豪總統決定幫助日本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的岸信介贏得勝選。美國艾森豪總統決定干預日本選舉的一個因素即是，希望美國與日本在冷戰時期的聯盟可以維持，且可以讓美國軍隊繼續駐扎在日本。根據

PEIG 資料庫顯示，1958 年，美國對日本選舉的干預是屬於公開選舉干預、有提供資金、對現任者提供選舉資助的類型。最後的結果也正如美國所希望，岸信介贏得選舉，且與美國重新簽訂美日安保條約。

從表三、表四、表五的實證結果顯示，強權國家對目標國的選舉干預確實會影響該國的民主制度，特別是水平課責機制。同時在聯合國大國與美國投票立場一致的前提為該國的民主制度受到美國選舉干預的侵害。而這樣的實證結果也正好說明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受到內生性變數的影響，而非外生給定所決定的。

因此，本文將過去強權國家對目標國的選舉干預會傷害該國的民主以及美國的選舉干預會增加目標國與其外交政策相似性的文獻連結起來。研究結果發現，在選舉干預會損害水平課責機制的前提下，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選舉干預確實會增加兩國之間在聯合國大會採取一致的投票立場，增加兩國外交立場的相似性。

伍、結論

外交援助、經濟制裁、軍事干預、選舉干預等外交工具的應用，施行的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皆希望可以達到所冀望之政策目的，並可以增加自身利益。以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外交援助來看，並非所有該組織的外交援助都可以幫助目標國恢復金融危機之前的經濟水準。有時候會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外援條件過於嚴苛，反而使受援國的政治、經濟、金融等相關體制陷入更深的泥沼，更促使國內社會醞釀出反國際組織與反全球化的抗議聲浪，造成社會動盪。

過去研究指出，外國援助對於受援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有正面與負面。但外交援助、經濟制裁、選舉干預、軍事干預則是會侵害目標

國的民主制度。中國對自然資源豐富國家進行外交援助時，會侵害受援國的水平監督機制。目標國政府為獲得額外的援助資金，有時會規避其他政府機關的監督與制衡。正如 Ping et al. (2022) 的研究所指出，以中國外交援助為例，中國對受援國特定自然資源有需求；受援國則是需要中國的資金援助來建設基礎設施以便後續相關自然資源的開發。加上援助的資金並無附帶改革條件，在這有利雙方的援助條件下，沒有透明且獨立的監督機制是有利於雙方的。而受援國的水平課責機制也會因此而被犧牲掉。

本文的研究結果也顯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的秘密與公開選舉干預確實會對目標國的水平課責監督造成損害。原因正如前所述，外國勢力對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的選舉支持會讓選舉失去公平性。此外，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尤其是執政者，為了可以順利地得到並利用此外國勢力的幫助，通常會想辦法規避其他政府部門的監督。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民主制度下政府機關彼此之間相互監督制衡的精神就會慢慢地被侵蝕。因此，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會對民主制度造成危害，尤其是對水平課責監督機制的損害。

Levin (2021) 認為美國對特定偏好政黨或候選人的選舉干預會增加目標國與美國外交政策的相似性。本文認為該文的論點是符合實際外交現況的。從禮尚往來（give and take）的角度來看，我支持你/妳在選舉中獲得勝利，你/妳就必須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支持我。因此，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在冷戰時期與後冷戰時期對他國的選舉干預，確實會使目標國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場與其相近。但是達到外交政策相似性的前提是，目標國個別政府機關之間的水平課責監督機制要先受到損害。

這也是為何 2016 年時，有學者認為美國的民主正在遭受俄國的侵害。Diamond (2019) 指出俄國透過網路釣魚郵件來對希拉蕊及其總統競選團隊進行攻擊。獲取了有關希拉蕊總統競選團隊相關競選資訊，希望藉此干預希拉蕊在民主黨內的總統初選結果。另外，2017 年美國中情局、調查局、國安局也研判俄國總統普丁嘗試減少希拉蕊勝選的可能性，並協助川普勝選，同時降低美國人民對美國民主程序的信任。普丁這樣的做法其實是希望可以緩和與美國過去在外交政策上敵對的局勢，並希望可以藉此維護俄國的國家利益。然而，這樣的選舉干預手段反而失去選舉的公平性原則。若目標國在外交政策立場上趨近干預國時，是以目標國的水平課責機制受到損害為前提。因此，在探究兩國之間外交政策立場相似與否，必須探究內生性因素如何影響國家外交政策。並非如現實主義的假設那樣，當國家看到一個崛起的大國，就會自動地找其他國家結盟來制衡大國。國家外交政策的選擇，並非是外生給定的，制衡或扈從的策略選擇，要先看兩國之間的外交政策是否有相似性。而民主程度、經濟發展、地緣等內生性因素則是會影響國家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變化。而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分析小國與強權國家之間外交政策的相似性，也是本文未來可以延伸的研究議題。

參考書目

-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5: 1369–1401.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9.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idt, Toke S., Facundo Albornoz and Esther Hauk. 2021. “Foreign Influence and Domestic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9, 2: 426–487.
-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 430–456.
- Bennett, D. Scott and Matthew C. Rupert. 2003. “Comparing Measures of Political Similarit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S versus τ_b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7, 3: 367–393.
- Benson, Brett V. and Joshua D. Clinton. 2016. “Assessing the Variation of Formal Military Allianc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 5: 866–898.
- Berger, Daniel, Alejandro Corvalan, William Easterly and Shanker Satyanath. 2013. “Do Superpower Interventions Have Short and Long Term Consequences for Democra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1, 1: 22–34.
- Bollen, Kenneth A. 2011. “Evaluating Effect, Composite, and Causal

- Indicator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MIS Quarterly* 35, 2: 359–372.
- Bolt, Jutta, Robert Inklaar, Herman de Jong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8. “Rebasing Maddison: New Income Comparisons and the Shape of Long-Run Economic Development.”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18. Groningen, Netherlands: GGDC,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et al.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nd George W. Downs. 2006. “Intervention and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0, 3: 627–649.
- Burnside, Craig and David Dollar. 2000. “Aid, Policies, and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4: 847–868.
- Cain, P. J. and A. G. Hopkins. 1993. *British Imperialism: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 New York: Longman.
- Cheibub, José Antonio, Jennifer Gandhi and James Raymond Vreela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143, 1: 67–101.
- Collier, Paul and David Dollar. 2002. “Aid Allo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 8: 1475–1500.
- Collier, Paul and Anke Hoeffler. 2004. “Aid, Policy and Growth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8, 5: 1125–1145.
- Coppedge, Michael et al. 2020. “V-Dem [Country–Year/Country–Date] Dataset V10.”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Project. Gothenburg, Sweden: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 Dalgaard, C. J. and H. Hansen. 2001. "On Aid, Growth and Good Policie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7, 6: 17–41.
- Diamond, Larry. 2019.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Easterly, William. 2003. "Can Foreign Aid Buy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 3: 23–48.
- Gartzke, Erik. 1998. "Kant We All Just Get Along? Opportunity, Willingnes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 1: 1–27.
- Gartzke, Erik. 2000. "Preferences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4, 2: 191–212.
- Green, Donald P., Soo Yeon Kim and David H. Yoon. 2001. "Dirty Poo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 2: 441–468.
- Hansen, Henrik and Finn Tarp. 2000. "Aid Effectiveness Dispute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 3: 375–398.
- Jackman, Simon. 2009. *Bayesian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1st ed.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m, Soo Yeon and Bruce Russett. 1996. "The New Politics of Voting Alignment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4: 629–652.

- Kisangani, Emizet F. and Jeffrey Pickering. 2008. "Internatio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1989-2005." Data Collection No 21282.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Kugler, Jacek and Ronald L. Tammen. 2012. *The Performance of Nations*. Maryland : Rowman & Littlefield, Inc.
- Levin, Dov H. 2016. "When the Great Power Gets a Vote: The Effects of Great Power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on Election Result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0, 2: 189–202.
- Levin, Dov H. 2019a. "A Vote for Freedom? The Effects of 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on Regime Typ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3, 4: 839–868.
- Levin, Dov H. 2019b. "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by the Great Powers: Introducing the PEIG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6, 1: 88–106.
- Levin, Dov H. 2021.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Foreign Policy Compliance, and Voting in the UN."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47, 3: 449–476.
- Marshall, Monty G. and Ted Robert Gurr. 2020. "Polity5: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8." Vienna, Va.: 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 in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Latest update 30 June 2021.
- Marvell, Thomas B. and Carlisle E. Moody. 1996. "Specification Problems, Police Levels, and Crime Rates." *Criminology* 34, 4: 609–646.

- Morgan, T. Clifton, Navin Bapat and Yoshiharu Kobayashi. 2014. “Threat and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s 1945–2005: Updating the TIES Dataset.”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31, 5: 541–558.
- OECD. 2014. “OECD Foreign Bribery Report: An Analysis of the Crime of Bribery of Foreign Public Officials.” Paris: OECD Publishing.
- Pearson, Frederic S. and Robert A. Baumann. 1993. “International Military Intervention, 1946-1988.” Data Collection No 6035. Ann Arbor: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Peceny, Mark. 1999. “Forcing Them to Be Fre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2, 3: 549–582.
- Peksen, Dursun and A. Cooper Drury. 2010. “Coercive or Corrosiv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6, 3: 240–264.
- Pemstein, Daniel, Kyle L. Marquardt, Eitan Tzelgov, Yi-ting Wang, Juraj Medzihorsky, Joshua Krusell, Farhad Miri and Johannes von Römer. 2020. “The V-Dem Measurement Model: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for Cross-National and Cross-Temporal Expert-Coded Data.” V-Dem Working Paper No.21. 5th edition. Gothenburg, Sweden: Varieties of Democracy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 Pickering, Jeffrey and Mark Peceny. 2006. “Forging Democracy at Gunpoi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 3: 539–559.
- Ping, Szu-Ning, Yi-Ting Wang and Wen-Yang Chang. 2022. “The

- Effec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65–84.
- Signorino, Curtis S. and Jeffrey M. Ritter. 1999. "Tau-b or Not Tau-b: Measuring the Similarity of Foreign Policy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3, 1: 115–144.
- Singer, J. David, Stuart A.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1972.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1965." in Bruce M. Russett. ed. *Peace War & Numbers*: 19–48.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Inc.
- Sweeney, Kevin and Omar M. G. Keshk. 2005. "The Similarity of States: Using S to Compute Dyadic Interest Similarit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2, 2: 165–187.
- Tammen, Ronald L.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 Walker, Scott and Frederic S. Pearson. 2007. "Should We Really 'Force Them to Be Fre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Peceny's Liberalizing Intervention Thesi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24, 1: 37–53.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ub. Co.
- 薛健吾。2020。〈歷史的終結？歐俄競爭下中東歐國家與俄國之間外交政策利益相似程度之變化（2000～2018）〉。《問題與研究》59，4：51–93。(Hsueh, Chien-wu Alex. 2020. "The End of History? Changes in the Degree of Foreign Policy Similarity Between 16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Russia Amid the
Russia-EU Competition (2000-2018).” *Wenti Yu Yanjiu* 59, 4: 51-
93.)

附錄一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的遴選集團理論 (selectorate theory) 主要包含勝選聯盟 (winning coalition)、遴選聯盟 (selectorate coalition)、國家居民 (residents) 三個主要概念。最核心的概念在於勝選聯盟 (winning coalition) 與遴選聯盟 (selectorate coalition) 兩者之間的比值 (WS)。成熟的民主國家因為有定期選舉，執政者必須盡可能地得到人民的選票支持才可以獲得勝選；而威權國家因為沒有定期選舉，主要是依靠私人派系、家族成員、軍閥等人的支持得以繼續執政。因此，民主國家的 WS 數值會比威權國家的大。

本文採用 Marshall and Gurr (2020) 與 Cheibub et al. (2010) 所建利的有關政治體制的資料庫來測量 WS。首先，本文將 Polity 5 裡的 XRREG (Regulation of Chief Executive Recruitment)、XRCOMP (Competitiveness of Executive Recruitment)、XROPEN (Openness of Executive Recruitment)、XCONST (Executive Constraints)、PARREG (Regulation of Participation)、PARCOMP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EXREC (Executive Recruitment Concept)、EXCONST (Executive Constraints Concept)、POLCOMP (Political Competition Concept) 等九個變數各自作為依賴變數，並將 Cheibub et al. (2010) 對國家是否為民主國家的變數視為自變數。然後在控制國家與時間的條件下，各自對前述 Polity 5 的變數進行最小平方方法估計，並計算出預測值 (predicted values)，然後將上述九個預測值加總起平均值得出 WS 值。

附表一為 OLS 個別估計的結果，為了閱讀方便，並未列出常數項、與控制國家及年份變數的係數。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國家對 Polity 5 各自依變數的影響，皆符合預期。以 XROPEN 為例，民主國家在行政官員徵補的開放性比威權國家還要開放。同時 XCONST 的估計

結果也顯示出，民主國家對行政官員的限制比威權國家較嚴格。PARREG 是唯一在估計係數為負數，因為該變數的概念是指對於政治偏好的表達是否有過多的限制。而一黨獨大的國家對人民的政治意見表達是有諸多法律限制的。也就是說，民主國家下，對於人民自由地表達政治偏好並未像威權國家那樣有諸多限制，因此民主國家是會減少對政治偏好的表達有過多的限制。

總而言之，附表一的概念呈現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在制度性民主（institutional democracy）的程度。加總後平均值愈高，代表該國家愈民主，政府的權力越受到限制，要贏得選舉則是需要更多的支持（WS 值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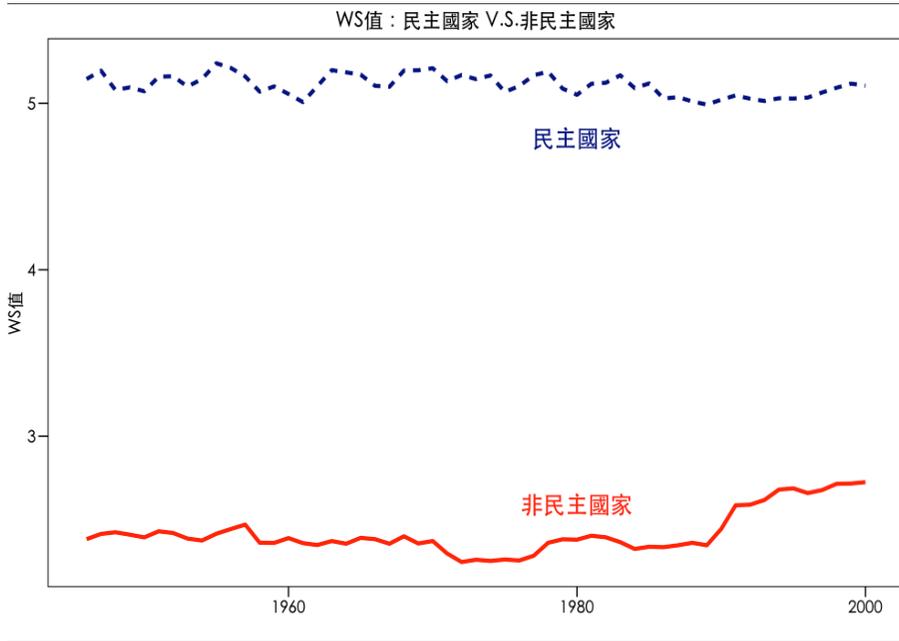
附表一 民主國家與 Polity 5 中有關制度民主變數的實證結果

	XRREG	XRCOMP	XROPEN
Democracy	0.795(0.016)***	1.604(0.022)***	1.424(0.044)***
R-squared	0.736	0.825	0.635
觀察值數目	6,477	6,477	6,477
	XCONST	PARREG	PARCOMP
Democracy	3.120(0.043)***	-0.816(0.030)***	1.389(0.033)***
R-squared	0.860	0.652	0.824
觀察值數目	6,477	6,477	6,477
	EXREC	EXCONST	POLCOMP
Democracy	3.044(0.045)***	3.120(0.043)***	4.299(0.070)***
R-squared	0.857	0.859	0.849
觀察值數目	6,477	6,477	6,477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附圖一是 1946 年至 2000 年，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 WS 值。可以明顯看出民主國家的 WS 值高於非民主國家的 WS 值。1946 年至 2000 年，民主國家 WS 值平均為 5.110；非民主國家 WS 值平均則是 2.147。因此附圖一的繪製結果也符合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2003) 的論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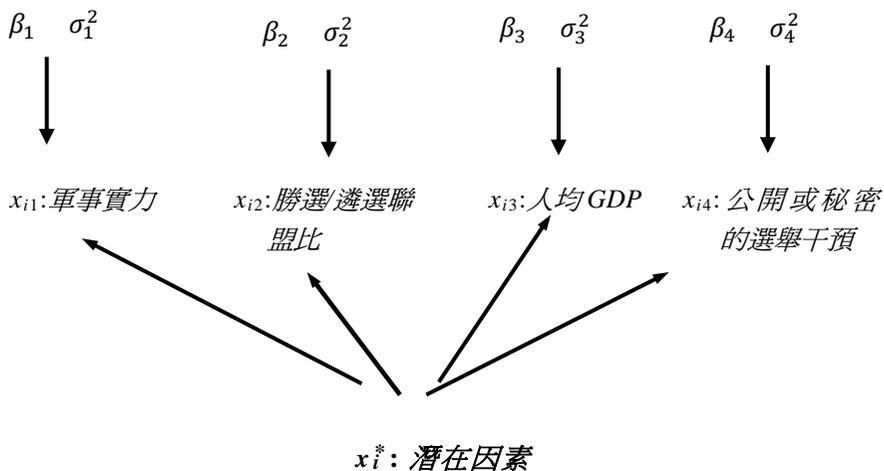
附圖一 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 WS 值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附表一的實證結果自行繪製。

附錄二

正如本文所提及的，選舉干預的程度是無法透過虛擬變數來進行比較。而在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外交競爭，是會受到各自軍事能力、經濟實力、國內政治等因素的影響。而這樣的因素也會影響到公開或秘密選舉干預的執行。更進一步來說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國內政治、公開或秘密選舉干預等可以觀察到的因素（observed factors）皆會影響選舉干預的程度。而這個選舉干預的程度即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因素（unobserved factor）。

前述無法直接觀察到的概念稱之為潛在因素（latent factor）或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而未觀察到的情況則是和直接觀察到的因素有所關聯。同時未考慮到潛在因素的估計，則是有可能會影響到估計的結果與推論（Jackman, 2009）。而貝氏潛在因素模型則是可以處理潛在因素與可觀察變數之間的關係，避免估計偏誤的情形發生。附圖二繪製出可觀察變數與潛在因素在貝式估計中之間的相關性。



附圖二 可觀察變數與潛在因素之間的關係

x_i^* ：潛在因素 代表前述所欲測量的選舉干預程度。而未觀察到的潛在因素是透過可觀察變數來進行貝式潛在因素模型估計。因此可以用下列公式（1）來表示：

$$x_i \sim N(\beta_{k0} + \beta_{k1} x_i^*, \sigma_k^2) \quad (1)$$

然後在透過公式（2）的概似函數（likelihood function）來估計觀察到的變數與潛在因素之間的關係。

$$\mathcal{L}(x^*, \beta) \equiv p(x|x^*, \beta) \propto \prod_{i=1}^N \prod_{k=1}^K \phi\left(\frac{x_i - \beta_{k0} - \beta_{k1} x_i^*}{\sigma_k}\right) \quad (2)$$

公式（2）即是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概似函數。而 β_1 到 β_4 係數的事前分配（prior distribution）在誤差項 σ_k^2 的條件下，是呈現常態分配。而 σ_k^2 的事前分配則是服從反伽瑪分配（inverse-Gamma distribution）原則（Jackman, 2009：439）。總而言之，根據貝氏定理（Bayes Theorem）透過結合資料觀察到的事前機率（prior probability）與概似函數來求得事後機率（posterior probability），即公式（2）的 $\mathcal{L}(x^*, \beta)$ 。這樣的事後機率即是在估計中納入潛在因素來修正觀察到的事前機率來減少誤差的可能性。以本文的例子來看，公式（1）與（2）估計後的結果，以軍事實力為例可以看成：

$$\text{軍事實力} \sim N(\beta_{k0} + \beta_{k1} \text{潛在因素}, \sigma_k^2)$$

換言之，選舉干預的程度會受到軍事能力的影響，且會透過觀察到的軍事實力來影響選舉干預之程度。附表二之一列出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估計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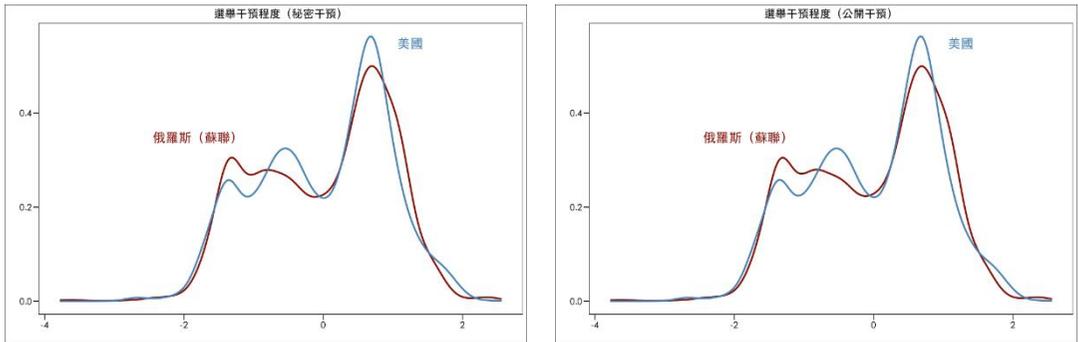
附表二之一 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實證結果

	美國		俄羅斯 (蘇聯)	
λ (因子分數)				
軍事實力	0.109(0.012)	0.109(0.012)	0.221(0.016)	0.219(0.016)
勝選/遴選聯盟比	-0.467(0.014)	-0.466(0.014)	-0.896(0.045)	-0.901(0.045)
人均 GDP	-0.996(0.012)	-0.997(0.012)	-0.516(0.027)	-0.513(0.027)
公開選舉干預	0.016(0.013)		-0.005(0.015)	
秘密選舉干預		0.005(0.013)		-0.005(0.015)
ϕ (誤差變異)				
軍事實力	0.986(0.019)	0.986(0.019)	0.950(0.018)	0.950(0.018)
勝選/遴選聯盟比	0.784(0.017)	0.784(0.017)	0.194(0.079)	0.185(0.078)
人均 GDP	0.012(0.014)	0.012(0.014)	0.732(0.031)	0.735(0.030)
公開選舉干預	0.997(0.018)		0.996(0.016)	
秘密選舉干預		0.997(0.018)		0.996(0.016)
Factor Loading：選舉干預程度				

括號內為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附表二之一可以看出在冷戰與後冷戰架構下，美國與俄羅斯(蘇聯)對他國進行選舉干預的程度，除了受到自身軍事能力的影響，國內因素也扮演重要角色。這樣的估計結果也符合美蘇兩強在軍備競賽的背景下，並以其為基礎來進行對他國的外交干預。而勝選/遴選聯盟比與經濟發展等國內因素扮演讓美蘇的選舉干預程度削弱的角色，以美國為例，選舉干預程度與經濟發展呈現負相關 ($\lambda=-0.996$)；軍事實力則是與選舉干預程度則是呈現正相關 ($\lambda=0.109$)。

然而本文也發現，經過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估計後，附圖二之一可以看出包含選舉干預與秘密選舉干預的方式對個別選舉干預程度的影響並未有太大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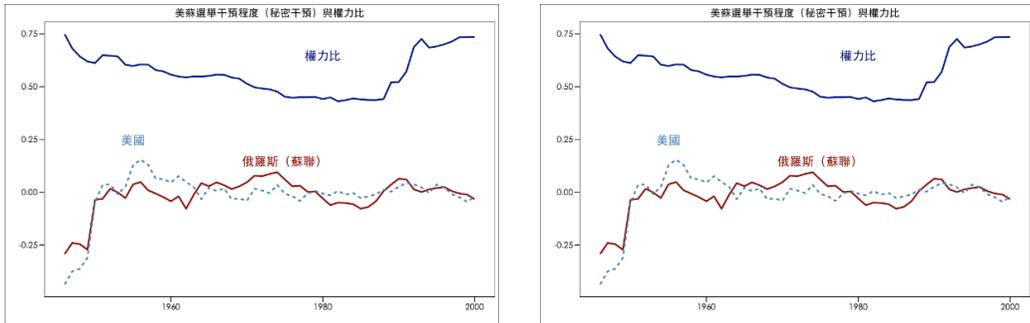


附圖二之一 公開或秘密選舉干預對選舉干預程度影響之密度圖
資料來源：作者依照附表二之一實證結果自行繪製。

附表二之一告訴我們冷戰與後冷戰時期，美蘇選舉干預程度與自身軍事實力有較高的相關性。附圖二之二可以看出在 1950 年至 1960 年間，當美國軍事實力高於俄羅斯（蘇聯）時，美國的選舉干預程度高於俄羅斯（蘇聯）。而之後當俄羅斯（蘇聯）軍事實力趕上美國時，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程度高於美國。1990 年之後，美國軍事實力高於俄羅斯（蘇聯），有一段時間美國選舉干預程度則是大於俄羅斯（蘇聯）。

本文是以軍事實力、勝選/遴選聯盟比、人均 GDP、公開或秘密選舉干預的條件下，將 Levin 原本只是虛擬變數的指標更進一步變成測量選舉干預程度的潛在因素。這也是 Bollen (2011) 所指的有效指標 (effective indicator)。經過貝氏潛在因素模型的估計後，選舉干預程度可以透過觀察到的變數來測量，並藉此以連續變數的呈現

方式使其具有可比性。



附圖二之二 美蘇之間權力比與選舉干預程度之間的時間序列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依照附表二之一實證結果自行繪製

因此我們可以對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程度在同一年度進行比較（**between**）。又或者也可以觀察同一國家在不同年度受到前述條件影響下選舉干預程度的變化（**within**）。

附錄三

附表三 描述性統計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選舉干預程度（秘密）	11,053	-0.001	0.952	-3.774	2.55
選舉干預程度（公開）	11,053	-0.001	0.949	-3.771	2.549
外交政策相似性	10,865	2.138	1.219	0	5.686
外交政策以美國為定錨點	11,053	0.5	0.5	0	1
外交政策以俄羅斯（蘇聯）為定錨點	11,053	0.5	0.5	0	1
人均GDP（log）	11,053	0.758	0.063	0.548	0.94
水平課責程度	11,051	0.038	1.05	-2.147	2.201
垂直課責程度	11,051	0.259	0.893	-1.573	1.76
勝選/遴選聯盟比	11,053	3.481	1.468	1.376	6.754
經濟制裁	11,053	0.051	0.22	0	1
軍事干預	11,053	0.014	0.118	0	1
權力比（%）	11,053	3.052	6.208	0.007	75.919
人口總數（log）	11,045	8.939	1.472	5.056	14.045
是否相鄰	11,053	0.053	0.225	0	1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所使用的資料進行整理

附錄四

附表四之一與四之二分別以 OLS 來探討美國與俄羅斯（蘇聯）選舉干預程度對目標國水平課責與垂直課責程度的影響。可以看出美國與俄羅斯（蘇聯）的選舉干預程度會損害民主國家的水平與垂直課責制度。另外，相較於對垂直課責的影響程度，選舉干預對水平課責影響的程度較大。這樣的實證結果與 Ping et al. (2022) 的研究結論類似。Ping et al. (2022) 認為中國對其他國家有關能源相關建設的外交援助，會弱化受援國水平課責監督機制。因為受援國政府為了獲得中國額外的外交援助，反而會規避其他政府機關的監督與制衡。

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為了得到美國或俄羅斯（蘇聯）的選舉援助，也會使該國的水平課責制度受到侵害。因為不管是公開或秘密的選舉干預，外國勢力的選舉援助是一種額外的幫助，而這樣的幫助反而讓受贈的特定政黨或候選人享有一定程度的優勢。為了接受外國勢力額外的選舉援助，受贈國特定政黨或候選人就必須規避、甚至違反該國的法律。如果是受贈的對象是執政者，那不只侵害了水平課責制度，也違反了公平選舉的精神。

附表四之一 選舉干預對水平課責影響的第一階段實證結果

	OLS 秘密干預	OLS 公開干預
依變數：該國水平課責程度		
選舉干預的程度	-0.027*** (0.008)	-0.027*** (0.008)
R-squared	0.807	0.807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1,051	11,051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附表四之二 選舉干預對垂直課責影響的第一階段實證結果

	OLS 秘密干預	OLS 公開干預
依變數：該國垂直課責程度		
選舉干預的程度	-0.007 (0.008)	-0.007 (0.008)
R-squared	0.743	0.743
是否控制國家因素	✓	✓
是否控制年份因素	✓	✓
觀察值數目	11,051	11,051

括號內數值為標準誤，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文中所述各項變數之資料來源。

How Electoral Intervention Influences the Similarities of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cy: Electoral Interven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46-2000

Cheng-Han Tsai *

Foreign aid, economic sanctions, and military and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are standard diplomatic tool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re is an opposite debate about whether foreign aid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cipient countries based on past research. Beside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and economic sanctions will hurt the level of democracy in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Levin (2021) demonstrated that successful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increase the similarities of foreign polic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cipient countries. In this article, I apply Partisan Electoral Intervention by the Great Powers dataset (PEIG)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democracy, and the similarities in foreign policy. Because PEIG utilized dummy variables to proxy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we cannot distinguish the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dimensions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from the various types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 Moreover, we cannot explore how the latent factors affect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Hence, I apply the Bayesian latent factor model to explore how unobserved and observed factors will influence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Bayesian latent factor variables, from 1946 to 2000, 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power drove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Soviet Union). Also, there is in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the covert and overt electoral means. At the same time, I figured out that the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ncrease the similarities of foreign policy with the host governments. However, the premise is that the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urt the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of the host governments; hence, they will have similar foreign positions.

Keywords: electoral interventions, the level of democracy, the degree of electoral intervention, Bayesian latent factor model,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